

百年经典
学术丛刊

梁启超 撰

佛学研究十八篇

陈士强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百年经典
学术丛刊



梁启超 撰

佛学研究十八篇

陈士强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学研究十八篇 / 梁启超撰;陈士强导读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12

(百年经典学术丛刊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125 - 0

I. ①佛… II. ①梁… ②陈… III. ①佛教—文集
IV. ①B948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4145 号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佛学研究十八篇

梁启超 撰

陈士强 导读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5 字数 322,000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2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152 - 0

B · 763 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导读

陈士强

清末民初,在社会改革思潮的冲击下,积弱已久的中国佛教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景象。杨文会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创始者,先后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,前者广搜佛经,刻印流通,后者办学授课,培育佛教人才,一代佛教义学之风由此而得以开启。

自此以后,佛教团体和组织,如中华佛教总会、上海佛教居士林(后改名为“世界佛教居士林”)、中国佛教会等相继诞生;佛学院和佛学研究会,如华严大学、观宗学社、支那内学院、武昌佛学会、闽南佛学院、三时学会、汉藏教理院等陆续成立;佛教出版机构,如上海佛学书局、北京刻经处、天津刻经处、重庆刻经处等纷纷涌现;佛教刊物,如《佛学丛报》、《佛教月报》、《佛学半月刊》、《海潮音》、《内学》等不断问世;《大藏经》、佛教辞典、佛教经律论,以及佛教注疏、论著、史传,如《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》(铅印本)、《续藏经》(影印本)、《佛学大辞典》、《法相辞典》等源源刊行;佛教各宗,如华严、天台、法相、

净土、律、禅、密宗均受到弘扬；中外佛教，如中国与日本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；不同语种，如日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佛典的汉译工作积极开展；作为佛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，如施医、施食、施衣、救济贫困、造桥、修路、种树等广泛进行，凡此种种，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梁启超说：“晚有杨文会者，得力于《华严》，而教人以‘净土’，流通佛典，孜孜不倦，今代治佛学者，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。”（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）对这一现象作了概括。

虽说其间也曾屡次发生过社会上的一些激进分子，以“庙产兴学”为名，企图侵夺寺产的事件，佛教内部围绕太虚提出的僧制改革，形成过对立的两派，但这毕竟是佛教复兴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小插曲，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佛教复兴，在多种力量的混合作用下，稳步地得到推升。此间，不仅涌现了一批有名望德行的佛教僧人、居士，也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专治或兼治佛学的佛教学者，梁启超就是兼治佛学类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（一）

梁启超是在其师康有为的影响下，开始接触佛教的。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中，盛赞“佛学之博大精深”，认为“大同（大同世界）之后，始为仙学，后为佛学，下智为仙学，上智为佛学”（癸部《去苦界至极乐》）。梁启超评论说：“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。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，故最得力于禅宗，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。”（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）又说：“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

精奥博大,余夙根浅薄,不能多所受。”(《三十自述》)表明他的佛教因缘,始于老师康有为。

梁启超又是在与同道好友谭嗣同的交往中,切磋佛学,加深研究的。谭嗣同初学今文经学,甲午战争后,为救国图存,转向新学(即“西学”)。1896年,谭北游访学,在北京与梁启超结识,全面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。同年夏天,谭到达南京,从杨文会研习佛学,历时近一年。谭的代表作《仁学》就是住在杨文会的寓所里写的。在《仁学》中,谭嗣同提出:“佛教大矣,孔(指儒教)次大,耶(指耶稣教)为小”;“凡为仁学者,于佛书当通《华严》及心宗、相宗之书。”如同梁启超所说的,谭嗣同“自交梁启超后,其学一变。自从杨文会闻佛法,其学又一变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。谭嗣同在南京时,梁启超正在上海办《时务报》,谭嗣同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,就《仁学》中涉及的理论问题(包括佛学问题),与梁启超“迭相商榷”(见梁启超《三十自述》)。

梁启超早年推尊佛教的“三界唯心”说,认为“豪杰之士”之所以没有“大惊”、“大喜”、“大苦”、“大乐”、“大忧”、“大惧”,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了“三界唯心之真理”而已(见《自由书》)。晚年,他笃信佛教的“无我”说和善恶报应说。他说,“无我”就是他的“信仰”,他之所以“常觉快乐”,悲愁不足以扰乱他的意志,“此即信仰之光明所照”(《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》)。又说,善恶报应是“宇宙间唯一真理”,“我笃信佛教,就在此点,七千卷《大藏经》也只说明这点道理”(《给孩子们书》)。1921年,他到南京东南大学讲学,曾到金陵刻经处,从欧阳渐(字竟无)学习唯识学,前后二十天,虽病不辍。他赞叹说:“听欧阳竟无讲唯识,方知有真佛学。”(《致蹇季常书》)1922年,欧阳渐在

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,梁启超与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。支那内学院校勘出版的《玄奘传》,在玄奘西行求法的具体年代上,采用的就是梁启超的“贞观元年”说,支那内学院有关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牟子理惑论》以及其他一些经论的辨伪,也受之于梁启超的影响和日本学者研究的启发。与居士系统创办的佛学院保持密切交往的同时,梁启超与僧人系统创办的佛学院也交谊深厚。1922年,太虚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,梁启超曾被推举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。

梁启超说:“我喜欢研究佛教”(《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》),“愿夙好治佛学史”(《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》)。为此,他经常将自己的研究心得,以著文或演讲的方式,传播于世。由于梁启超是当时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,学问和文章名满天下,故他的佛学文章如同其他文章一样,一经问世,便备受注目,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(二)

梁启超一生发表三十多篇佛学文章,它们分别刊载在《地学研究》、《改造》、《哲学》、《东方》、《清华周刊》、《图书馆学季刊》等刊物上。另外,还有若干篇手稿,如《说〈华严经〉》、《〈阿毗达磨俱舍论〉今读》等,未曾刊行(见李国俊《梁启超著述系年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)。所发表的佛学文章,经历了两次编集。

一次,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编辑出版的《梁任公近著》第一辑。此辑分为上、中、下卷,其中,中卷收录了梁启超于1922年10月亲自选定的佛学文章十二篇(附录一篇)。

梁启超在为该辑所作的“叙”中说：“中卷，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，内有《中国佛教史》之一部分，都凡十二篇。”所辑的十二篇是：

(1) 《佛教之初输入》(附：《〈牟子理惑论〉辨伪》，作于1920年)

(2) 《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》(作于1920年)

(3) 《翻译文学与佛典》(作于1920年)

(4) 《佛教与西域》(作于1920年)

(5) 《佛典之翻译》(初撰于1920年，改定于1922年)

(6) 《读〈异部宗轮论述记〉》(作于1920年)

(7) 《说〈四阿含〉》(作于1920年)

(8) 《说〈六足〉、〈发智〉》(作于1920年)

(9) 《说〈大毗婆沙〉》(作于1920年)

(10) 《读〈修行道地经〉》(作于1920年)

(11) 《〈那先比丘经〉书》(此辑目录中作《〈那先比丘经〉书后》，但正文的标题则无“后”字，疑是脱漏所致。作于1920年)

(12) 《〈大乘起信论考证〉序》(作于1922年)

上述文章均作于1920年至1922年之间。此为商务印书馆版的梁启超佛学专集。以集中收录的佛学十二篇为底本刊行的单行本名为《中国佛教研究史》(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)。

另一次，是上海中华书局于1932年编辑出版的《饮冰室合集》，《合集》分为《文集》和《专集》两类，其中，《专集》第十四、十五册，收录了梁启超的佛学文章十八篇(附录十篇)。1936年，中华书局又将这些文章从《专集》中抽出，编为单行

本刊行,这便是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。此为中华书局版的梁启超佛学专集。

中华书局版的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,与商务印书馆的《梁任公近著》第一辑(中卷)相比,正文新增了七篇:

- (1)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(作于 1920 年)
- (2)《印度佛教概观》(作于 1920 年)
- (3)《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》(作于 1925 年)
- (4)《又佛教与西域》(作于 1920 年)
- (5)《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》(作于 1920 年)
- (6)《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》(作于 1925 年)
- (7)《见于〈高僧传〉中之支那著述》(作于 1922 年)

附录新增了八篇:

- (1)《佛教大事表》(作于 1920 年)
- (2)《汉明求法说辨伪》(作于 1920 年)
- (3)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辨伪》(作于 1920 年)
- (4)《说无我》(作于 1925 年)
- (5)《佛教典籍谱录考》(作于 1920 年)
- (6)《佛教心理学浅测》(作于 1922 年)
- (7)《支那内学院精校本〈玄奘传〉书后》(作于 1924 年)
- (8)《〈大宝积经·迦叶品〉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》(作于 1924 年)

在两版同收的一些文章中,其编次与篇名也略有改动。如《〈大乘起信论考证〉序》,在商务印书馆版中为正篇,而在中华书局版中则改为附录;商务印书馆版中的《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》,在 1921 年 9 月 15 日《改造》第 4 卷第 1 号刊出时,已易名为《中国印度之交通》,故中华书局版也采用后名。这

样,中华书局版的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,就将所收文章的截止年代,从1922年延长至1925年,使之成为梁启超晚年佛学代表作的汇编。

(三)

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,粗看起来,是一部论文集,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,就会发现:它的主体乃是梁启超撰写的《中国佛教史》的未定稿,以及为撰书而作的相关研究(如经论、史传的研究)的心得。

笔者的这一说法有何证据?请看梁启超的自述:

《佛典之翻译》前言说:

“本篇是民国九年春夏间所作《中国佛教史》之第五章。近两年来继续研究之结果,对于原作大不满意,正思得数月余力,全部改作,本篇为当时用力最勤者,不忍抛弃,故采以入此。其中见解与现时所见悬殊者仍甚多,材料亦多缺漏,组织亦未完备,存之以备与他日新著相较云尔。”

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说:

“佛法确立,实自东晋。吾于叙述以前,先提出两问题:第一,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,且至东晋而始盛耶?第二,中国何故独尊大乘,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?此第二题,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。”

“输入事业之主要者,曰西行求法,曰传译经论,具详第四、第五章两章。建设事业,则诸宗之成立也,具详第六章以下。”

《印度佛教概观》说：

“吾故先为此章，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，述其概要，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，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。”

《佛教与西域》说：

“中印交通，以西域为媒介。故必先明此三地相互之关系，然后佛教输入之本末可得言也。……读《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》（笔者注：指《印度佛教概观》第一节），当已知迦腻色迦王与印度佛教之关系。”

《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》说：

“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，嗣因第□（六）章以下分论诸宗，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，叙述不便，故增设一章，以补其阙……（按：分论诸宗稿未成）。”

“如本篇第一章（笔者注：指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）所言：楚王英、襄楷时代，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，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，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。”

《翻译文学与佛典》说：

“现在藏中佛经，号称最初译出者，为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然此经纯为晋人伪作，滋不足信（拙著《中国佛教史》别有考证）。”

“《大乘起信论》，旧题真谛译。近来学界发生疑问，拙著《中国佛教史》别有考证。”

“吾并不主张‘大乘非佛说’，不过承认大乘经典晚出耳。其详见拙著《中国佛教史》。”

根据梁启超的以上自述，并参校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的其他内容，不难推出以下的结论：

梁启超曾于 1920 年春夏撰《中国佛教史》。初稿分为二篇六章。第一篇是讲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的,因为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本源,西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媒介和途径。下分二章:《印度佛教概观》(其扩展性研究,构成《说〈四阿含〉》、《说〈六足〉、〈发智〉》、《说〈大毗婆沙〉》、《读〈异部宗轮论述记〉》、《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》等文)和《佛教与西域》(其扩展性研究,构成《又佛教与西域》)。第二篇是讲中国佛教的,内容包括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。下分四章:《佛教之初输入》(此文曾发表在 1921 年 8 月 15 日《改造》第 3 卷第 12 号上,梁启超自注:“此为拙著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二篇第一章。”其扩展性研究,构成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一文,梁启超后以此取代《佛教之初输入》,作为第二篇第一章)、《中国印度之交通》、《佛典之翻译》(其扩展性研究,构成《翻译文学与佛典》、《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》)、《诸宗之成立》(未成,后改为《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》。其扩展性研究,构成《见于〈高僧传〉中之支那著述》)。梁启超在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等文中说的第四、五、六章,都是按第一篇二章的顺序排下来说的,实是第二篇的二、三、四章。

由于佛教史牵涉的方方面面极广,这不是花几个月的时间,就能研究透的。故随着研究的深入,梁启超对原作大不满意,想全部改作,又苦于没有时间,最后便决定以论文集,而不是以专著的方式刊行。这就造成了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形式上是论文集,其实质是《中国佛教史》的未定稿及其衍生产品的情由。

(四)

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的特点是,从史学的角度出发,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,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。内容叙及:佛教的产生;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(五蕴、十二因缘、业、轮回、无常、无我、涅槃等);阿育王、迦腻色迦王的护法事迹;印度境内佛教宗派的分布情况;中印之间的交通;佛教东渐的路线;西域来华的译僧;西行求法的古德;佛教输入中国的年代和地点;汉明求法说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牟子理惑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传说和经典的辨伪;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;佛经翻译的演进(包括译场的组织、翻译理论的提出、翻译文体的改进,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);佛教经录的地位;汉唐高僧的著述;玄奘的行历年谱;《四阿含》、《大毗婆沙》、《异部宗轮论述记》等经典的梗概,等等。其中,有不少见解与论述,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论,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。

如关于佛经的成立。梁启超提出“四个观念”:一、佛经并不是佛在世时就有的,无论是哪一乘(大乘或小乘)哪一派所传的佛经,都是佛入灭以后佛弟子追述而成的。其中,最初编成的,在佛灭数月之间,最晚编成的,在佛灭五百年以后。二、佛经的追述,有团体公开结集和个人私著两种方式,前者有确切的时间可考,后者则无从确考。三、佛经的流通,分为单行本和丛书两种形式,现存的十多部大经(指《阿含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、《宝积经》、《大集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涅槃经》等),均是丛书。而这种丛书,有的是在确定的时间内编纂而成的,有的是经历若干年的增补附益才告完成的。四、佛经最初皆

无写本,全靠记诵而得以流传。写本大约产生于佛灭数百年以后,随着佛教的传播,逐渐写录成各国文字。简略地说,佛经都是翻译文学(见《说〈四阿含〉》)。

关于研究《阿含经》的必要性。梁启超认为,我国自隋唐以后,学佛者以谈小乘为耻,《阿含经》被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,已有一千年了。但是,“真欲治佛学者,宜有事于《阿含》”,也就是说,真正想研究佛学的,应当从《阿含经》入手。其原因有六:第一,《阿含经》是最早形成的经典,采用公开结集的形式产生,最为可信。虽然不能说佛的教说(“佛说”)已经全部收集于《阿含经》之中,但《阿含经》作为佛的教说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,则是无庸置疑的。第二,佛经的大部分,都是文学作品,《阿含经》虽然也不免有文学的成分,但与其他晚出的佛经相比,比较少,比较接近于朴实说理的性质。因此,虽然不能说《阿含经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佛语,但它所含的佛语的份量多而且纯,则是其他佛经所不能及的。第三,《阿含经》的体裁实际上是言行录,与《论语》的性质大致相同,要想体验佛的现实的人格,舍此没有别的途径可寻。第四,佛教的根本教理,如四谛、十二因缘、五蕴皆空、业感轮回、四念处、八正道等,在《阿含经》中均有详细的说明,假如连这些概念也弄不明白,那么,读大乘的经论,更无从索解。第五,《阿含经》非但与大乘经不相冲突,而且它本身就蕴含了不少大乘教义,不能因为它偏于小乘,而轻率地加以唾弃。第六,《阿含经》叙及当时社会的事情最多,读后可以了知佛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应机施化的良苦用心。异国异时代的人,怎样才能受用佛学,于中可以受启自觉(见《说〈四阿含〉》)。

关于西行求法的路线。梁启超综合佛教史传上的记载,

归纳为六条：一、“海路”。从广州、安南、青岛等地出发，乘船渡海，经诃陵（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）、师子（今斯里兰卡）等国，抵达印度。二、“西域渴槃陀路”。经西域的疏勒，或子合，或莎车，在渴槃陀（今塔什库尔干）翻越葱岭，进入迦湿弥罗（又称“罽宾”，今克什米尔一带）。三、“西域于阗、罽宾路”。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，登葱岭而入罽宾。四、“西域天山北路”。由拜城，出特穆尔图泊，经撒马罕而入阿富汗。五、“吐蕃、尼波罗路”。从青海入西藏，经尼波罗（今廓尔喀）而入印度。六、“滇缅路”。从云南出发，经缅甸而到达印度（见《中国印度之交通》）。

关于东汉至北宋佛经翻译事业的进化。梁启超勾勒了以下的轨迹：一、“以译本论”。起初多凭西域僧人的暗诵传译，后来发展到必求梵文原本。同是原本，起初仅译小品（篇幅小的经典或章节），后来才广译大经（卷帙多的经典）。同是大经，起初只是将其中的某些篇章，各自译出抄行，到后来才通译全书，首尾完备。二、“以译人论”。起初仅局限于西域来华的一些僧人，和不出名的个别居士，后来则基本上都是本国西行求法归来的鸿哲，和印度来华的大师。三、“以译法论”。初起大多是一人传语，一人笔受。后来则发展到主译者必是梵汉两通之人，而且辅以专门的口译、笔受、证义、勘文，每句译文，需经四五人之手，才能最终确定下来，勒为定本。四、“以译事规模论”。起初为私人性质，仅一二人，相约对译。后来则为国家性质，由朝廷出面组建译场，广罗俊才，进行翻译。五、“以宗派论”。起初译的是小乘经典，后来译出的是大乘经典。六、“以书籍种类论”。起初只译出经，后来才广译律、论、传记，乃至外道的经典（见《佛典之翻译》）。

关于佛家经录(佛经目录)的特质。梁启超认为,它比古代一般图书目录优胜的地方有五处。一、“历史观念甚发达”。每一部经典的传译渊源、译人小传、译时、译地,靡不详叙。二、“辨别真伪极严”。凡是可疑的经典,均详审考证,别存其目。三、“比较甚审”。凡是同一部经典,有同时或先后翻译的不同本子的,均详细地予以罗列,校勘它们之间的异同得失。如果属于从一部丛书中抽出一二种,或从一部经典中抽出一二篇加以翻译,然后别题书名抄行的,都一一注明出处,使读者免生困惑。四、“搜采遗逸甚勤”。即使是已经散逸的经典,也必存其目,以利日后的搜寻。使读者能根据经录的记载,知道它的亡佚年代。五、“分类极复杂而周备”。或以著译时代分,或以经典性质分。在按经典的性质区分的目录中,有的按经典的内容分,如既分经律论,又分大小乘;有的按经典的形式分,如分一译多译、一卷多卷等。在同一经录中,各种分类法并用,一部经典依照不同的类别交错互见,乃至十多处,给读者带来了种种查检的便利(见《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》)。

此外,梁启超为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制作的各种图表,如《第七世纪(佛灭后千二百年)印度诸国教势分布表》(见《印度佛教概观》)、《西行求法古德表》(见《中国印度之交通》)等,也为学者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。

(五)

在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的诸多论述中,于佛教界和学术界分歧最大、争论最多的是有关汉明求法说(指东汉明帝于永平

年中,因梦见金人而遣使前往西域求法,为佛教入华之始的传说)、《四十二章经》(相传为东汉迦叶摩腾、竺法兰翻译的汉地最早的佛经)、《牟子理惑论》(相传为东汉牟子所作的汉地最早的佛教撰著)、《大乘起信论》(旧题印度马鸣造,梁代真谛译)的辨伪。

梁启超认为,“汉明求法事,全属虚构”,“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《老子化胡经》”;“《四十二章经》,察其文体,案诸经录,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,绝非汉时所有”,此经“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,实撮取群经精要,摹仿此土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,别撰成篇。质之,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”;《牟子理惑论》“旧题汉牟融撰,实则东晋刘宋间人伪作”,“后汉末并无牟融其人者,则可断言也”,而且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,桓帝时,于闐“自此与中国绝”,“灵、献之交,中国人安得游于闐”(以上见《佛教之初输入》);《大乘起信论》“其为支那撰述而非印度撰述”,“出于我先民之手”(见《〈大乘起信论考证〉序》)。

对此,持赞同或类似观点的则有吕澂等人,持反对或相异观点的则有汤用彤、周叔迦等人。

吕澂认为,“说明帝永平七年,由于夜梦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”,“纯属后人的附会”;“《四十二章经》不是最初传来的经,更不是直接的译本,而是一种经抄”,“就内容看,是抄自《法句经》”,“是东晋初抄出的”;“《牟子》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。据我们看来,应该属于伪书”(以上见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,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);“《起信》所据皆魏译《楞伽》之错解,其思想学说,亦皆魏译时代所流行,于印度未尝见”,因此,可以论定“《起信》之为此方人士受魏译学说而成之撰述”(见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·起信与楞伽》,齐鲁书社1991年7月